

第1卷第2期, 2008年7月

(本期译自 Number 51, Spring 2008,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国际高等教育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Vol. 1, No. 2, July, 2008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全球问题

- “次贷”市场与国际高等教育.....1
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 一个新的趋势.....3
穆斯林社会中的学术自由.....5

私立高等教育进展

- 中国的民办高校: 对一个成功案例的研究.....7
墨西哥的需求导向型私立高校.....9

非洲高等教育

- 非洲高等教育: 展望未来.....11
尼日利亚的外国教育机构.....13
厄立特里亚的高等教育趋势.....15

印度高等教育

- 处在十字路的印度高等教育.....17
韦丹塔大学: 难以实现的梦想.....19

以色列高等教育

- 以色列的教育危机: 原罪的代价.....21
以色列私立大学的比较优势.....23

欧洲高等教育趋势

- 排名、多元化与卓越: 欧洲政策所面临的挑战?25
大学的绩效拨款: 意大利的经验.....27

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高等教育

- 伊朗高考危机.....29

- 新书简介31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主办

主编：刘念才
顾问：菲利普·G·阿特巴赫（美）
编辑：吴 燕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东川路 800 号上海交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
邮编：200240
电话：021-34205947*18
电邮：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kxyj/xskw.htm>

Editor: Nian Cai Liu
Advisor: Philip G. Altbach (USA)
Assistant Editor: Yan Wu

Address: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800, Dongchuan Road
Shanghai, 200240
China
Tel: 86-21-34205947*18
Email: 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kxyj/xskw.htm>

《国际高等教育》简介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交流的需求与日俱增。《国际高等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并将努力发挥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交流的桥梁作用。

本刊由两部分组成：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编辑出版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的中文版，每年 4 期；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围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编辑出版的专辑，每期一个主题，每年最多出 6 期。

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编辑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每期包含十余篇有关国际高等教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文章以及新书简介。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编辑的专辑则包含世界一流大学、大学评价与排名、研究生教育、科学英才迁移等热点问题的国内外研究论文、研究报告、综述文章、书评以及有关的会议和活动信息。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Guoji Gaodeng Jiaoyu) is an online journal with an aim of playing the role of bridge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ties. It consists of 4 issues each year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ed by the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USA and up to 6 issues each year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both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such as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ranking, graduate education, and migration of academic talents.

Each issue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y Boston College contains more than a dozen of short articles covering major aspects and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new publications. Each issue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ains original studies, preliminary reports, review papers, letter to the editor, book reviews, and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activities and opportunities on the selected topic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issues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published online at <http://gse.sjtu.edu.cn/en/>.

“次贷”市场与国际高等教育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对美国目前出现的次级抵押贷款和住房市场危机与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比较,可能会得到些许启示。首先,买家和房地产企业、金融企业都想进入不断增长且利润丰厚的房地产市场,这就同高等教育产业中的许多集团现在想进入国际高等教育市场一样。在房价飞速上涨的时期,卖家和买家都没有过多地询问产品本身的问题,这个市场得以毫不受限制地自由运作。于是,随着市场的日趋饱和以及许多投机客的进入,开始出现某种“非理性的繁荣”;从某一点来讲,这是一种“泡沫”心理。有些买家希望迅速获利,有些则未能认识到新贷款存在的风险。金融机构也深陷其中,并且发明了比以往更为复杂的金融产品,以便在全球分散风险。房地产和抵押贷款市场很快出现了过热的问题,并不断加剧,主要表现为监管力度不够、产品供过于求、价格难以持续、承诺无法兑现等。在采用抵押贷款按揭购房的情况下,这个泡沫不断膨胀并突然破裂,导致许多国家面临非常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值得关注的是,次级抵押贷款和住房市场危机从美国这一最大的市场开始,现在正在向世界各地蔓延。

国际高等教育目前正处在发展周期的中间阶段,即非理性繁荣和泡沫之间。现在已经到了需要认真审视各项措施和政策的时候,辨别哪些措施是可持续的,哪些不行?哪些政策是为学生和学术团体的利益服务的,哪些政策是错误的或仅仅是贪婪的产物?

整个学术圈正在努力地国际化,但动机各不相同,有些大学甚至不明白自己为何参与其中。从国际大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最近对全球学术带头人的一项调查可以发现,国际化的动机差异巨大,包括提高教师和学生的国际化程

度、改善课程、建立品牌、进行全球合作以及为科研提供机会等。令人感到费解的是,只有少数学术带头人提到了希望通过国际化营利;特别是考虑到澳大利亚和英国政府都强调牟利是国际化的关键目标之一,这样的调查结果更令人奇怪。欧洲和北美洲的大学校长们已成群结队地到中国和印度探索开设分校、进行合作和联合培养学生等项目的可能性。

现状

对于国际高等教育目前的状况,我们略知一二。目前大概有300万人留学海外,其中亚洲输出的留学生人数最多,接受留学生最多的则是那些以英语为母语的学术权力中心。据澳大利亚的一份研究估计,到2025年全球将有约800万留学生,跨界教育依旧有着巨大的市场。没有人知道全世界到底有多少海外分校,但估计有数以百计的分校,且几乎都分布在发展中或中等收入的国家中。名字中含有“××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字样的学校也在快速增加。除了开罗和贝鲁特那些与美国有关的老牌名校外,冠以“美国”这一名号、一般以英语授课的高校在整个发展中国家激增,最近还出现校名中带有“德国”、“法国”或“加拿大”等字样的高校。英语授课在全世界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教育市场,并带来了专业人员的全球流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规模庞大且不断增长,基本上不受管制。这种状况确实就像美国当年的“西部荒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东方荒原”。

问题所在

在高等教育中,可能有人持“市场将解决自己问题”的观点,因此应对高等教育放手不管。次贷市场危机与高等教育有着某种

相似性。在次贷市场中，在没有任何监管或限制措施的情况下，允许不择手段的玩家们肆意妄为，鼓励更多的著名银行购买有风险的债权，终于导致了全世界今天所面临的次贷危机。在危机形成的过程中，为了减少先前可能已经存在的风险责任，使用了极其复杂的金融产品，世界各国的许多机构都购买了这些金融产品。

在国际高等教育中也有类似的心态，即认为每个人都能进入国际高等教育市场。包括学术机构和营利性教育机构在内的卖家，在不受管制的市场上大量出售教育产品，能够轻易地进入全球市场。在卖家中，有些是非常有声望的大学，他们希望建立海外联系，招收顶尖的学生，在全球市场内提高品牌的知名度。但许多卖家本身就是次级机构（subprime institutions），比如希望通过出口市场避免破产的廉价教育提供者、学位工厂或水平低下的私立高校。甚至一小部分受人尊敬的大学也由于政府拨款的减少而被迫进入外国市场牟利。

包括学生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学术机构在内的买家也同样不受管制，有时非常不了解情况，经常表现得很天真。最悲惨的是那些在信息不充分或者不了解情况下就购买了国际教育服务的学生及其家长。如果有些学生进入了那些次级机构学习，或者出国的目的更多在于打工而非学习，就有可能上当受骗。发展中国家那些不知情或本来就贪得无厌的高校也有可能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的低水平高校合作，提供不合格的教育。在这些国家，可能完全没有监管机构，或者监管措施非常不适用，以至于完全不可能实现质量保证。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也

没有足够多的高水平大学吸收潜在的海外合作伙伴。此外，全球大多数高校都缺乏能成功参与高水平国际合作项目的基础设施。

如何避免危机

建设一个健康的国际高等教育环境，透明是关键。这意味着政府、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大学能够提供有关国际高等教育的准确信息。尽管现在能够获得的可靠信息非常少，但有关开展国际高等教育的动机及政策的信息也很有用。不应该让市场自己决定国际高等教育的成功或失败。有些利益获得者，尤其是主要“卖家”所在国的政府（如美国、澳大利亚、英国以及营利性教育产业）认为高等教育应该向国际市场开放，并且由世界贸易组织通过的《贸易服务总协定》进行规范。这种被迫的开放可能会导致全世界易于产生非理性的繁荣和泡沫心态，这种情况在按揭产业已经非常明显了，在高等教育领域也正日益增多。

这个世界还是需要监管的。监管可以由政府进行，以便确保国家的利益得到满足，学生及其家长免遭不良教育机构不法经营的伤害。同时，这也有利于学术机构思考其进入全球教育市场的动机。国际化是全球高等教育中具有积极作用且不可避免的一步，包括学生流动、跨界提供教育以及参与全球21世纪的知识经济。学术界需要避免次贷市场那样的危险做法，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危机。

作者注：此文曾刊登于伦敦《泰晤士报——高等教育》。

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一个新的趋势

Ute Lanzendorf

德国卡塞尔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

电子邮箱: ulanzend@incher.unikassel.de

在过去的十年中，有关跨国大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海外分校这种模式。最近几年，另一种类型的跨国大学发展迅速，即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foreign-backed university）。

超越海外分校的模式

与海外分校模式相反，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不是由外国学术机构建立的，而是由本国富有的个人、地方政府或企业建立的。本国的创建者为新的大学提供或争取经费，但是把学术发展事宜授权给一个或几个国外的合作大学（担任“指导者”或“监护人”）。因此，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在法律上是完全独立的本土大学，而学术上则附属于国外的一所或几所大学。

作为“指导者”的外国大学，一般负责课程开发与质量保证措施，支持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协助培训教师；它们往往把自己的教师派送到其他国家的高校。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授予本国的学位。在有些情况下，除了授予本国学位外，还授予指导大学的学位。指导大学通常从新建大学的创建者那里获取报酬，而不是从学费收入中获取利益。

一旦新建大学的运作走上轨道后，指导大学就可能退出，但这些大学及其国家政府通常都在新建大学的董事会中占有永久性席位。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的校长有时由本土人士和外国学者共同担任，至少是在学校的创建阶段如此。不过，对财务和业务问题负最终责任的一般是本国创建者。

产生的原因与理由

从本土的情况来看，建立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的初衷不仅仅是增加学习的场所、减少出国留学的人数、防止人才外流；创建者

还希望通过引进国外有关教育和组织的专业经验与创新来丰富本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其中引进以劳动力市场为导向的教育项目是非常重要的目标之一。在某些情况下，学术上依附于外国的大学被看作是引进研究性学习的机会。

由于外国的大学对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没有所有权，创建者可以决定并非常容易限制外国大学对新大学学术发展的影响程度。与海外分校模式相比，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既借鉴了先进大学的专业经验，同时又保证了所有权在自己手里，并确保完全遵守本国高等教育的法规和质量保证要求。许多建立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的国家都明确规定不允许建立外国大学的海外分校（特别是埃及、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只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马来西亚同时具有两种类型的跨国大学。

从作为“监护人”的外国大学角度来看，对其他国家的新建大学进行学术支持在跨国高等教育中是一种参与度相对较低的形式。这对于他们提高国际影响力来讲，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方式，因为组织和经济风险较小而发展潜力较大。

情况概览

据无边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Observatory on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最近的一份报告称，全世界共有24个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www.obhe.ac.uk，2008年2月）。在建立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的国家中，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埃及与中东地区的国家）、东欧和中亚地区的国家尤为突出。在阿拉伯国家，由私人或政府出资协助创建这些大学。在东欧和中亚地区，本土的大学创建者利用国际发展基金作为新学校的基本建设经费。目前，

埃及是全世界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最多的国家，合作方包括德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大学。德国雅各布斯大学（Jacobs University）由美国的大学支持，这说明外国机构不仅对发展中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兴趣，而且对现代化过程中成熟的高等教育系统也有兴趣。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正在不断增加，比如对外国教育机构在本国高等教育中的发展一直保持谨慎态度和严格控制的巴基斯坦，最近已要求若干国家支持他们建立新的大学。

最重要的指导大学输出国是德国和美国，其次是英国。有趣的是，澳大利亚作为最大的海外分校输出国，在指导大学输出方面并不具有代表性。印度尼西亚的瑞士-德国大学是唯一一所接受一国以上的外国大学进行学术指导的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目前，最大的3所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3,000至5,000名学生）是阿联酋的美国沙迦大学（1997年首次招生），由美国大学参与的科威特海湾理工大学（2002年首次招生），以及开罗的德国大学（2003年首次招生）。

外国指导大学包括各种类型的大学：大到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马来西亚科技大学的指导大学）或德国的亚琛工业大学（阿曼-德国理工大学的指导大学），小到专注于教学的专科性高校。创建者往往根据大学的特定教学模式选择指导大学。一些学术依附型大学的创建者为每个学院选取不同的外国合作伙伴，以提高办学实力。

一般来讲，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由所在国进行认证或许可。美国高校参与的大学往往会争取获得额外的美国认证。德国参与的大学也计划得到德国机构的专业认证，因为在德国没有对高校进行的学校认证。

除了少数的例外，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目前提供高于或相当于硕士水平的课程，或者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提供。埃及的英国大学和马来西亚理工大学从设计之时就旨在进行研究生教育。一些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还计划提供博士生教育（联合培养）。这样的学校大多数计划参与可以获得外部经费的应用研究和咨询。

结论

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的建立和运行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挑战，它需要本国创建者和外国指导大学之间密切合作。为了将国外大学的模式整合到本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去，必须进行深入的对话。两个国家对课程质量的要求都必须得到尊重。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于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获得成功的因素有不同的看法，应加以协调。创建者往往倾向于多招学生及校企合作、应用研究与咨询，但学术“监护者”可能对高水平的教学和学术的兴趣高于新建学校的所有权。如果外国机构参与型大学运行良好，就能促进国家之间不同类型高校的合并与相互适应，实现真正的“跨国高等教育”。

穆斯林社会中的学术自由

Richard Kraince

墨西哥学院 (EI Colegio de Mexico) 东南亚人文研究助理教授

自从柏拉图学园 (Plato's Academy) 成为宗教狂热的受害者, 已经过去近 15 个世纪了。在教育活动进行了 900 年后, 由于查士丁尼大帝在整个拜占庭帝国推行基督教的标准, 不仅导致宗教迫害的泛滥, 而且关闭了世界上最杰出的古典学术机构——柏拉图学园。在那个时期, 悲剧源于: (1) 新兴的社会宗教派系之间激烈的争论; (2) 统治者狂热地支持特定的宗教派系, 而不是加强不同派系间的互相宽容; (3) 把自由探索当作是对巩固神权统治的威胁。时至今日, 由于全球化加剧了宗教成为冲突来源的可能性, 不同社会的学者在进行与宗教政治势力意志不同的学术探索时, 继续遭到迫害。

在许多穆斯林社会中, 学术自由现在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辩论话题。学术自由是指学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进行自由探索并公开发表言论而不担心受到报复。尽管经常与正在发生的丹麦卡通画争议搅在一起 (主要是长时间地争论构成仇恨言论的因素), 但穆斯林社会对学术自由的争论主要是努力建立实证分析和思想批判的传统, 这两种传统在全世界都是充满活力的社会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然而, 就像查士丁尼的军队一样, 有些伊斯兰政治团体认为这些传统是对他们主宰的社会秩序的挑战。

伊斯兰教和专制主义

在穆斯林社会建立尊重学术自由的传统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是长期以来存在的专制文化。由于大多数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仍然处于专制统治下, 穆斯林学者面临着与其他专制国家中的学者一样的压力。比如叙利亚、苏丹和沙特阿拉伯, 统治者主宰并限制着大学及其校园内的氛围, 这与白俄罗斯、埃塞俄比亚和缅甸世俗政权努力控制学术界的做法一样。所有这些国家对学术自由的反对往

往是质疑批判理智主义是否恰当, 特别是当学者们提出自由表达政治观点的要求时, 出现反对学术自由的状况并不令人吃惊。

在穆斯林社会, 独裁统治者和反对派都利用宗教政治意识形态。政权领导人通常号召神职人员支持自己, 而伊斯兰团体 (有些有过暴力反抗的历史) 联盟则是政治反对的主要形式。由于各方都热切地寻求在高等教育中建立自己的势力, 因此学术自由的斗争往往蒙上了政治冲突的阴影。比如埃及、巴基斯坦和阿尔及利亚, 独裁当局大大削弱了校园内的自由, 以限制伊斯兰反对团体的影响。同样地, 在那些伊斯兰主义者控制的国家中, 比如巴基斯坦穆罕默德齐亚哈克 (Mohammed Zia-ul-Haq) 将军统治时期 (1977-1988 年), 对学校的管制旨在限制世俗力量的活动。所有这些情况几乎都有共同的主题, 不仅包括单纯的学术统治, 还包括把宗教作为对那些敢于质疑宗教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学者进行迫害的辩护工具。

迫害

对学者的迫害有很多形式。在某些情况下, 黑暗卫队的目标是教师, 例如孟加拉国达卡大学的语言文学教授胡马云·阿萨德 (Humayun Azad)。他是孟加拉语言学的著名专家, 出版了大量著作, 包括一本第一描写孟加拉女性问题的严肃著作。由于他在最新出版的小说中把伊斯兰主义者和民族主义极端分子描绘成了反面人物, 2004 年他差一点被一群暴徒砍死。但 6 个月后阿萨德还是死于德国, 他本希望在那里躲避进一步袭击的。

在另一些情况下, 对学者权利的侵害往往通过法院或其他政府机构进行。例如, 伊朗塔比阿特莫达勒斯大学 (Tarbiat Modarres University) 的历史教授哈谢姆·阿哈加里

(Hashem Aghajari) 因为在他的学术论文中称伊朗的教权主义制度与原始的伊斯兰教教义不符, 2004 年被保守的宗教法庭定为叛教罪并被判处死刑。虽然死刑最终被伊朗最高法院驳回, 但阿哈加里还是在监狱中呆了两年, 支付了一笔可观的保释金后才被释放。

埃及学者纳斯尔·哈密德·阿布栽德 (Nasr Hamid Abu-Zayd) 的著名案例, 说明了如何利用伊斯兰法律制度压制具有批判精神的伊斯兰研究者。阿布栽德以前是开罗大学从事伊斯兰研究的教授, 在他对当代伊斯兰话语 (discourse) 和他所谓的埃及伊斯兰银行界的“社会与经济丑闻”之间的关系进行批判后, 他被一个伊斯兰家事法庭送进了监狱。该法庭根据他所从事的学术工作——古兰经诠释, 宣布他是叛教者。法庭还成功地找到理由, 即保护他的穆斯林妻子免于因嫁给非穆斯林而获罪, 宣称阿布栽德的婚姻无效。由于在家乡一直被法律纠缠, 阿布栽德和他的妻子移民到了荷兰, 现在他在乌得勒支大学里担任人文主义和伊斯兰研究方面的阿威罗伊教席 (Averroës Chair)。

发展趋势

对学者受迫害和威胁问题的觉醒是穆斯林社会学术自由的一个趋势。几个人权组织正在为那些受到威胁的学者提供支持。尤其是受难学者援救网络 (Scholars at Risk

Network) 建立了一个系统, 通过这个系统大学可以向学者提供庇护。这些努力不仅对牵涉到的个人极其重要, 而且还有助于揭示对学术自由的侵犯, 鼓励各个领域的国际学术共同体长期倡导学术自由。

荷兰的学者最近通过一系列的专题出版物使学术自由的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 比如《欧洲的宗教研究和对穆斯林神职人员的培训: 21 世纪的学术和宗教自由》(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the Training of Muslim Clergy in Europe: Academic and Religious Freedom in the 21st Century, William B. Drees 和 Pieter Sjoerd van Koningsveld 编, 2008)。最重要的趋势也许是伊斯兰教育界对学术自由的问题越来越关注。2005 年 9 月,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伊斯兰大学举行的穆斯林世界宗教课程国际研讨会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Religious Curricula in the Muslim World) 上 (<http://www.iiu.edu.my/iimu/info.php?inford=26>), 由伊斯兰教育工作者起草的决议对一些伊斯兰团体的不宽容表示失望。那些教育工作者认为应该拓宽宗教课程、促进思想和言论自由, 但同时他们并不赞成讨论不同意识形态和法理之间的差异, 这种做法自相矛盾。因此, 虽然这些决议的确反映了进步, 但那些教育工作者还是认为查士丁尼主张建立正教的传统应该继续蓬勃发展。

中国的民办高校：对一个成功案例的研究

Ruth Hayhoe, Jing Lin

Ruth Hayhoe: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教授; 电子邮箱: hayhoe@bellsouth.net

Jing Lin: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系教授; 电子邮箱: Jinglin@wam.umd.edu

自1999年开始扩招以来,中国已迅速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2006年民办高校的在校生规模已占正式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总数的6.6%,即2,020万名在校大学生中有134万在民办高校就读。主要的公立大学在扩招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不仅扩大了常规在校生的规模,还建立了能够创收的民办二级学院,这些学院得益于大学具有的自我认证资格和高水平的教师。这些卓有成效的二级学院共有在校生147万名,约占总数的7.3%。

由于二级学院具有得天独厚的地位,独立的民办高校如何在竞争中获得成功?河南省黄河科技学院的案例可能回答这个问题。1994年,该校获得高等专科学位授予权,成为全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民办高校;1999年,该校又成为第一所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民办高校。到2007年,该校37个本科专业的在校生规模为13,000人,另外还有5,000名大专生和15,000名接受成人教育的学生。学校分别与上海同济大学和武汉华中科技大学这两所公立名牌大学合作,开设少量的硕士生专业。这些数据使黄河科技学院处于中国独立民办高校的领军地位,因为目前只有24所民办高校有资格开设本科学位专业,其他的1,250多所只能举办专科教育。

学生的来源和质量

黄河科技学院70%的学生来自有9,700万人口的河南省,其中大部分来自农村。其他30%的学生来自国内的其他地区。这些学生往往在高考中考分较低,学校领导非常清楚需要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并提供注重实用和面向就业的教育。因此,学校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拳头学科群,如电视与广播播音专业、广告设计专业、适合县级地区就业需求的工程和建设专业,以及自我就业的音乐专业。

学生的学费平均都在10,000元左右,比河南公立大学平均3,000元的收费要高出很多,但比当地其他二级学院13,000元的学费要低些,这一收费标准在吸引省外学生方面也有竞争力。学生有很多机会实习或参加自己组织的校园活动,但学校的纪律比公立大学更严格,大部分住在学校宿舍的学生都受到辅导员密切监督,这些辅导员由负责学生事务的副书记领导。

教学和科研

吸引和留住合格的教师对民办大学而言是一个挑战,黄河科技学院的师资状况作为比较成功的案例,可以对该问题说明一二。学校目前有800名全职教师,500名兼职教师,师生比是1:19。包括院长和系主任在内的资深教授大都是公立大学的退休教授,具有良好的资质和丰富的经验。许多年轻教师都拥有公立大学的硕士学位,首轮合同期为5年,任职2年后可以晋升为讲师。2006年秋季,130个新教师岗位吸引了260个以上的硕士毕业生来应聘,这主要因为中国的硕士学位修读年限从3年减到2年。还有一些本科毕业生也被聘为教师,通常是因为他们具有相关的专业技能,但他们的待遇相对要低一些。

从建立之初,黄河科技学院就非常强调教学上的卓越,因为这对吸引学生极其重要。目前,学校的主要精力放在教学水平的提高上,不仅邀请了校外有经验的教授做顾问,还实施了各种支持教学提高的措施。2008年6月,该校第一次接受国家教育部正式的教学水平评估,这是继获准开设更多的专业之后,又一个标志着学校被公众认可的重要里程碑。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其教学工作量很大,平均每周12课时。科学研究活动才

刚刚开始,最近有19个项目已在河南省教育厅和社会科学院登记在案。46位从事这些项目研究的教师得到的奖励是降低教学工作量,学校期望他们建立一个新的科研文化。这就是黄河科技学院在内部提供经费的情况下,让他们的科研获得公共认可的方式。

学校的治理与财政情况

中国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是法人,2003年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政府允许民办学校的投资者获得合理的回报”。民办高校的所有资产由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比如黄河科技学院的两座大校园;但校园内的许多服务可能是由经营性公司提供,并成为学校的收入来源之一。政府不直接监管学校的财政预算,因此利润或者合理的投资回报仍然是一个灰色地带。2002年的法律规定学校的治理由董事会监督,黄河科

技学院最近也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委员会,但其成员主要是内部领导人,包括校长和其他几个创始成员。虽然遵纪守法很重要,但与当地政府和政治领导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很关键。因此,学校的首位校长在199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97年在学校里建立了党委。在学校的建设过程时,她还与自己的家庭成员密切合作,包括任用她的女儿作为负责对外事务的执行副校长,以及最近将她在美国金融界工作的儿子召回担任首席财政官。这种“家族负责制”的情况在中国的民办大学中相当普遍。

尽管黄河科技学院并不是一所典型的民办大学,但却是极少数有这样强大的领导力的学校之一,这使得它成为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政府的政策使得很多民办高校都处于不利地位,在与公立大学二级学院的竞争中面临很多困难,并且很少有资格授予本科学位。

墨西哥的需求导向型私立高校

Juan Carlos Silas

墨西哥蒙特雷大学 (Universidad de Monterrey) 教育学院教授

电子邮箱: jsilas@udem.edu.mx

由于人口、社会和政治状况的改变,墨西哥的高等教育充满着活力并在重新塑造自己。高等教育作为墨西哥发展最迅速的领域,其大发展包括在校生规模和高校数量的急剧增长以及高校类型的多元化。

需求导向型高校

需求导向 (demand-absorbing) 这个术语及其基本特征由私立教育的研究先驱丹尼尔·列维 (Daniel Levy) 在 20 年前引入。他发现为了满足需求而建立的高校学术水平低下、学科领域很窄、规模通常较小,也不追求学术上的卓越,是完完全全的非精英型高校。与其他高校相比,这些高校基本上依靠学费收入 (虽然他们的收费低于其他私立高校),很少接受捐赠,其生存之道主要在于从公立高校聘请那些对赚取额外收入感兴趣的教授来讲课,并且把运营费用控制在最低限度。

在墨西哥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促使需求导向型大学建立的因素有一些共同点,包括:大量中等教育文凭持有者希望进一步深造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限制低水平高校发展的监管力度不足,以及公立高校因财力有限而无法招收更多合格学生。在高等教育需求日益增多、税收调整和财政经费限制的情况下,教育机构和希望接受教育的学生不得不寻找其他形式来满足需求,包括建立学生能够负担得起的职业教育高校,为那些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学生提供接受高等教育机会。

需求导向型高校的增长

实证数据表明,墨西哥大部分需求导向型高校都与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多样化

有关,私立高校在校生规模约占在校生总规模的 16%。高校和专业的多元化与人口压力和高等教育职能的范式转变关系密切,新的范式似乎更注重发展与就业市场有关的职业教育。在这些新建立的专业和高校中,不是根据学术教育理念而是根据职业教育理念进行教学,教授与职业有关的专业知识和工作技能。选择就读需求导向型高校的学生在挑选学校和专业时,所考虑的因素包括投入更少的精力、能够同时学习和工作,以及预期的投资收益。

在过去的 25 年中,非大学型的私立高校在墨西哥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趋势。一种是仅仅在某一特定领域从事教学 (如通讯科学、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烹饪) 的学校。另一种是通常由企业创办的小规模高校,这些学校仅在某一特定的地区提供收费低廉的传统职业教育,这些传统职业通常都与服务业直接相关。在墨西哥和其他国家,政府和教育系统似乎非常清楚并容忍这种高校的扩张,以便为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需求导向型高校目前的状况

2005/06 学年的数据显示,墨西哥 87% 的需求导向型高校是私立高校。这些学校共有本科生 328,803 名,分别占私立高校和所有高校在校生总数的 48.5% 和 16%。这些学校绝大部分规模都比较小,其中 40% 的学校只有 100 个学生或者更少。然而也有 8 所招生规模超过 5,000 名学生的学校,据报道,其中一所学校的教学点有 33 个,学生规模超过 1.6 万。

目前,墨西哥需求导向型高校主要依靠非合同制的教学人员进行教学,并且将重点放在学士学位 (四年制本科学位) 教育上。

在 777 所需求导向型大学中，65%（506 所）学校都是全靠“小时工”（兼职人员）进行教学。79% 的学校只提供学士学位教育，其余 21% 的学校提供学士和硕士学位教育。所

开设的专业几乎都不需要实验室等昂贵的基础设施，大部分都是能够在就业市场快速找到工作的行政管理、人文、教育或计算机专业。

非洲高等教育：展望未来

Damtew Teferra

美国纽约福特基金会国际奖学金项目非洲和中东地区主管

电子邮箱: teferra@bc.edu

在过去的十年里，非洲出现了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政策转变、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求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幅度增加，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然而，这个地区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包括失业人口和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众多、《服务贸易总协定》等国际制度带来的不确定性、教师人数减少以及人才大规模流失等。

解放和新生

在几十年的国际制裁阴影中，非洲高等教育侥幸存活了下来，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世界银行支持的回报率研究认为，高等教育对非洲而言是个无法负担的奢侈品。世界银行因此降低了非洲大陆发展高等教育的贷款力度。其他的国际发展伙伴和主要的慈善组织，甚至是一些完全独立的组织，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把非洲高等教育从其发展日程中撤了下来。非洲各国政府对大学的忽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外部因素造成的。

随着肯定高等教育在全球化过程中作用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Hig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Peril and Promise, 世界银行，2000）和《创建知识社会》（Constructing Knowledge Societies, 世界银行，2002）的出版，世界银行的态度开始转向支持高等教育，确确实实地解放了非洲的高等教育。这一做法为世界银行、其他发展伙伴和各国政府在非洲大陆恢复和扩大高等教育体系创造了机会。有人认为这一重大的政策转变是过去十年中非洲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发展。

私立高校扩张的公共影响

在许多非洲国家，升级的和新建立的公

立大学都经历过学生数量猛涨的阶段。尽管如此，私立高校的增长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非洲大陆高等教育最显著的发展之一就是私立高校的迅速增长。例如在埃塞俄比亚，十年前根本没有私立高校，但现在已有60多所；肯尼亚有18所，坦桑尼亚有20所，尼日利亚有32所。然而，大众的入学需求还远未被满足，该地区的入学率才仅为5%。

由于全球经济自由化政策促进了非洲大陆私立高校的增长，这对公立高校的经费投入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为了应对这一趋势，公立大学开始实施成本分担机制，有些观察家认为这是公立大学的“私有化”。有关创收的禁令现在已经放松，对于成本分担的争议也减少了。然而，由于公平、质量等问题开始受到关注，这些发展正在被重新评估，入学机会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更严重的是，私立高校的扩张致使财政紧张的政府忽视公立高等教育的扩张，限制了政府对公立高等教育的支持。

在非洲，最近新建立的若干所与宗教无关的私立高校，具有许多与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同类高校一样的特点。这些学校通常是面向市场小规模高校，开设大众需要的课程，依靠学杂费生存；其教学经常依赖于从公立大学聘请的教师，大部分教师都是兼职人员，无人从事科研工作；几乎不提供研究生教育。

私立高校一般都不太稳定并存在资源不足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依赖学杂费生存的高校。然而，由宗教团体建立、提供经费并运营的私立高校正在非洲地区不断增加，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扩大入学机会与提高质量

随着非洲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迅速增加，质量问题成为学生、家长、监护人、雇

主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不断担心的问题。这种担心对私立高校影响巨大。由于公众和政府对于私立高等教育的快速增长、教学及问责机制存有疑问，私立高校在非洲大陆的公信力尚未建立。

在过去的几年里，许多国家建立了质量保证和认证办公室，在登记、认证以及吊销高校许可证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非洲这些私立高校的现状和运营标准依然有不少需要改进之处。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的私立高校正在主动地进行自我监督、保护自己的利益、开展有关对话并集体控诉所受到的冤屈。比如说2005年在埃塞俄比亚建立的私立高校联盟。

公共资金：是否正在缩减？

高等教育在非洲仍然是公共事务，尽管这一局面正在迅速改变。资金依然是阻碍非洲高等教育体系扩大和更新的问题。经济增长率低、投资前景微弱、就业率不稳定、贫困和疾病（如艾滋病）的四处蔓延将继续制约非洲在这个开放的教育子系统（高等教育）中获得大笔利润的能力，这个系统不久前还被称为“奢侈品”。

学术自由和自治：发展趋势？

众所周知，非洲经常出现军事和专制独裁统治镇压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情况。但由于民主化之风正吹过整个地区，一个个独裁者相继下台，人权和知识分子的空间尽管发展缓慢但在不断前进。

随着非洲大陆反对派运动和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大学作为社会运动先锋的作用已大大降低。事实上，最近许多领导人和反对派政治家都曾经是大学教授、知识分子或高级专业人才，这些人反对暴政，对大学的学术自由和自治更加宽容。

信息和通信技术：成功与失败

人才流失尤其是高级技术人员的大量流失对高等教育和非洲的总体发展来说仍然是一个长期的挑战。然而，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创新使移居他国的知识分子往往能够以教学、联合研究、发表著作以及顾问的形式参与到祖国的学术发展之中。

虽然非洲仍是世界上通信最不发达的地区，但信息和通信技术所带来的转变也非常有助于当地大学的教学、科研和出版工作。

电子邮箱、网络和电子杂志的使用有助于解决非洲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所面临的与世隔离的状况。学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已显著增加，整个地区内部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已经被有效地联系在一起。

然而，上网速度慢、服务成本高、电力供应不稳定和不可靠、技术支持缺乏、软件和硬件使用时限短，以及不断需要升级等问题，将继续挑战该地区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结论

外部机构摒弃不利于非洲高等教育的政策、知识经济带来的协同作用、区域经济的开放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前所未有的发展，都在过去的十年中对非洲大陆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非洲的高等教育依旧面临着众多挑战，包括入学率低且不公平、需求巨大、经费投入能力有限、教师减少（由于退休和死亡）、教学水平低、科研产出不高、毕业生“不符合要求”、人才大量外流，以及国际环境不确定（比如《服务贸易总协定》）。

由于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建立充满活力的高校已成为关键。因此，想要成为国际舞台上有一价值的一员，非洲必须付出坚实的努力，建立一个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尼日利亚的外国教育机构

Isaac N. Obasi, Olamide E. Adesina, Susan N. Obasi

Isaac N. Obasi: 尼日利亚波兹瓦纳大学副教授; 电子邮箱: zikobasi@yahoo.com

Olamide E. Adesina: 尼日利亚全国大学委员会; 电子邮箱: olamidesther@yahoo.com

Susan N. Obasi: 尼日利亚大学讲师; 电子邮箱: sueobasi@yahoo.com

最近的文献表明, 跨界高等教育不再是一个新的现象。在尼日利亚被英国殖民统治时期, 伊巴丹大学(University of Ibadan) 1948年就是作为伦敦大学的一个学院被建立的。那些公认的外国高等教育机构一直都是尼日利亚高等教育发展的合作伙伴。然而, 全球化背景下的跨界高等教育已经出现了重要转变, 主要原因在于交付方式的技术越来越先进, 动机大都以获取利益为目的。尼日利亚的情况也反映着全球的新趋势, 反映着教育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里一项可交易商品。

外国教育机构的层次

尼日利亚的外国教育机构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具有国际水准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机构, 比如罗耀拉耶稣会学院(Loyola Jesuit College) 和乐卡英国学校(Lekki British School)。

第二个层次由企业组成, 提供证书和学位教育, 以及与信息技术有关的终身教育课程, 其方式既有远程教育也有面对面的教育。这个群体的运营不受国家高等教育许可和质量保证机构的管辖。比如尼日利亚 NCC 教育集团, 它宣称将给顾客“带来英国式教育”, 提供能够获得一些英国大学学位的学位教育。日内瓦的国际文凭组织(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 通过拉各斯的私立学校 D-常春藤学院(The D-Ivy College) 运作, 提供两年制的学位教育。信息学院授予计算机专业的国际证书。印度阿博泰克有限公司(APTECH), 该公司标榜自己是全球学习问题解决公司专家, 并且已经上市。

第三个层次是那些为希望到海外留学

(特别是英国) 的学生提供教育支持服务的外国商业公司。其中一些公司举办的教育博览交易会现在已成为每年的惯例, 在这些展会上能有效地推进留学生的招生。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国际教育集团(EduWorld International), 它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美国大学的主要招生机构。另一些在招生方面领先的机构包括英国教育培训和入学服务机构(British Educational Training and Admission Services)、阿伯尔·莱特学院(Abel Wright College) 及 IBT 教育集团(IBM Education Group)。IBT 集团是一家澳大利亚教育公司, 为英国伦敦国际商务技术学院(LIBT) 和赫特福德学院(HIBT) 招收学生, 这两个学校分别又与英国克斯桥的布鲁贝尔大学(Brunel University at Uxbridge) 和赫特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有伙伴关系。这些机构的活动中有令人不安的一面, 即承诺留学生可以快速完成学位课程。例如, IBT 的英国学院可以把课程压缩到最多一年。

第四个层次, 也是本文主要关注的, 是那些被认可或不被认可的机构以及有商业公司性质的高等教育机构。

低劣的跨界教育机构

全国大学委员会(National Universities Commission) 是尼日利亚唯一负责对所有提供大学学位教育的高校进行登记和认证的机构。任何一所未经全国大学委员会认可和认证的高校都是非法的。在尼日利亚, 越来越多的本土商业教育企业和外国教育咨询公司代表外国大学提供各种各样的学位教育。比较典型的是新概念咨询公司(the New Idea

Consultants), 该公司自 1997 年以来一直都是圣克莱门茨大学 (St. Clements University) 的“学位工厂”。经过调查, 发现这个机构除了非法经营外, 还开设了学制为 24 个月的远程博士学位课程与 9-15 个月 MBA 和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全国大学委员会 2005 年下令关闭了它在尼日利亚的非法境外教学机构。

2005 年, 尼日利亚教育部长宣布在联邦首都阿布贾地区发现了一所代表外国大学非法提供医学教学的大学。尽管政府对此并没有掉以轻心, 但这些外国教育机构的广告还是在每天的报纸和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然而, 更令人担忧的是, 国际教育集团在一个博士学位教育 (由三一学院提供) 的互联网广告中承诺 6 个月完成学业, 而且是“通过 100% 的在线远程学习”。尼日利亚出现的这些欺诈案件也进一步证实了已经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现的调查结果。一些外国大学也在尼日利亚经营海外硕士学位课程。比如加利福尼亚林肯大学通过尼日利亚的 SKB 公司运营一个 MBA 教学项目, 代表荷兰商学院的奈尔洛德大学 (Universiteit Nyenrode) 也运营着一个硕士专业。这两个项目都来自低水平的教育机构, 其课程都没有经过全国大学委员会的官方批准。

积极的发展

尽管存在上述的非法机构, 但在尼日利亚快速发展的私立高等教育产业中, 也有法律许可的外国机构, 反映出全球化的一些积极方面。有些机构与本土得到许可的私立大

学一起合作, 其合作方式基本上满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的《跨界高等教育指南》(Guidelines on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或满足非洲大学协会在《阿克拉宣言》(Accra Declaration, 2004) 中关于《服务贸易总协定》和非洲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些期望。其中之一是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学合作的尼日利亚美国大学, 其办学模式效仿了阿联酋的沙迦美国大学。

监管情况

尼日利亚目前既有严格的又有松散的监管框架。在高等教育层面上, 即使对基于互联网的非法跨界教育进行监管的能力有限, 但国家的监管框架还是有约束力的。但在层次较低的学位教育和信息技术课程方面, 尼日利亚没有能力遏制那些未获得认可或低劣的跨界教育机构的活动。

建立全面的监管框架

与高层次跨界教育机构的合法活动相比, 尽管全国大学委员会没有制定详细的政策阻止低层次跨界教育机构的非法活动, 但尼日利亚政府目前正考虑打击那些低劣的跨界教育机构。自 2005 年起, 全国大学委员会就开始着手建立全面的监管框架。但是, 这一进程推进的速度有些缓慢, 因此我们建议迅速采取行动, 一些声誉良好的外国教育机构有可能在尼日利亚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厄立特里亚的高等教育趋势

Ravinder Rena

厄立特里亚理工学院 (Eritre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ai Nefhi) 商业与经济系副教授

电子邮箱: ravinder_rena@yahoo.com

经过30年的解放战争后,厄立特里亚于1991年宣布独立。厄立特里亚是一个位于非洲之角的小国,人口大约400万。它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估计在200美元左右,贫困率约为66.5%。

厄立特里亚的高校

为了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厄立特里亚政府自从独立后就开始努力进行人力资源建设。因此,该国唯一的大学——阿斯马拉大学 (University of Asmara) 在1992-2007年间已培养了约1.2万名毕业生(包括2007年9月毕业的1,505名学生),其中一半以上是本科生,该校的毕业生都在不同的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工作。此外,该大学从2004年开始在6个不同领域设立硕士学位专业。这些专业都是通过政府或双边合作协议提供的资金运作的。与此同时,学校还扩大了其本科专业数量。该校目前共有260名教师,其中120名拥有博士学位;教师中的厄立特里亚人共50名,执教于43个系。阿斯马拉大学现在已经被暂时关闭,因此所有的教职员工都转到了厄立特里亚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由于高校中本土的人力资源不足,政府已经(签订合同)从印度聘请了约300名外教,从巴基斯坦聘请了10名外教。外籍教师约占本校教师总数的60%。所有教师,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全职人员。2004年,投入阿斯马拉大学的经费约3,589万纳克法(约合239万美元)。

2004年,厄立特里亚在国内不同地区新建了8所学院层次的高校。这些学院提供各种英语授课的学位和学位教育。估计约有15,000名学生在这些学院学习,其中大约有25%的人完成学业毕业,剩下75%获得的是证书和文凭。这些学院的建立依赖于世界银

行2亿美元的贷款项目。

2004年7月,阿斯马拉大学成立了研究生院,管理各学院的研究生教育。据1995年(12年前)的估计,厄立特里亚需要培养一千多名硕士生。这种需求现在已经提高了,因为厄立特里亚正面临着人力资源发展的危机。

2004年9月,35名硕士研究生开始在6个学科领域学习,分别是农业经济学、园艺学、应用土壤学、可持续畜牧生产、发展经济学和有机化学。其中已有27名学生于2006年毕业。2005年又招收了35名硕士研究生,其中29名学生于2007年毕业。然而,2006年没有招收硕士生。所有本科和研究生课程都用英语教授。如前所述,阿斯马拉大学自2006年9月起已经关闭,不过它将作为一所只开设硕士和其他研究性专业的大学重新开放。

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目标

阿斯马拉大学希望通过研究生教育努力提供高水平人才和有关知识,但面临着许多挑战。学校在开始进行硕士研究生教育时,设立了许多目标。

厄立特里亚在粮食安全,自然资源探索和管理,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以及卫生事业、性别比例等方面都存在问题。以研究为基础的研究生教育必须让研究生们在国家需要优先解决的领域从事研究。我们相信,研究生们的研究将有助于解决困扰国家发展的重大挑战。同时,研究生教育也可能提高大学与新成立学院中各层次教育的质量与实用性。

开展研究生教育将有助于节省目前用于在外国大学培养研究生的外汇支出。截至2005年,已经有1,700多万美元被用于1,100

多名厄立特里亚人在外国大学的学习。大部分经费都是由发展伙伴和非政府组织捐赠的。在本国建立最终能够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研究生教育，将有助于把那些资金用于建设厄立特里亚的科研能力和教育设施。

遏制人才外流将为国家留住合格人才，并节省人才培养所花费的巨额外汇。在公派出国的1,100名留学生中，有35%-40%的人学成后留在了发达国家。这对赞助机构的发展计划已造成负面影响。在国内进行研究生培养，不但可以节省大量的外汇，也有助于把人才留在国内。

阿斯马拉大学最终可能从教学型大学转变为教学研究型大学，因为研究生教育既涉及研究也涉及教学。根据学校的政策，开设研究生教育的系至少必须有三个获得博士学位的核心教师。因此，理学院、文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农学院和商学院开设了相关的专业。

战略原则

厄立特里亚的国家需求是决定其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根本原则。专业的设置不仅应该以追求知识为目的，而且需要解决国家所面

临的社会经济和科学问题。因此，本国的利益相关者也参与到每个学院组织的课程体系评估活动中去。这种做法既可以让各院系根据国家的需要调整其课程和研究计划，也可以让本国的利益相关者通过为研究生提供设施而为研究生教育做出贡献。

为了实施质量原则，在课程设计的整个过程中都有外部合作伙伴的参与。根据已有的构想，研究生的培养将尽可能地由阿斯马拉大学与南北方合作伙伴的高校（荷兰、瑞典、印度和南非的大学）之间联合进行，以这些高校的课程质量为标准，并鼓励每个系至少邀请一名来自合作方大学的教授授课，共同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

虽然厄立特里亚的各级教育都是免费的，但可以通过收取学费实施可持续发展原则。实验学科和非实验学科每名学生每年的学费分别是5,000美元和3,500美元。由于学生负担不起这个学费，政府可与合作伙伴签署必要的协议来解决这一问题。此外，研究生教育连同研究中心一起，计划通过咨询活动和科研合同为自己提供20%的经费。然而在研究生教育发展成熟之前，都需要政府提供经费支持，但这项任务并非易事。

处在十字路的印度高等教育

Pawan Agarwal

印度西孟加拉邦科学、技术和少数民族事务部部长

电子邮箱: Pawan.agarwal06@gmail.com

在过去几年中,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功于科技发展。印度规模庞大且不断发展的高等教育造就了一大批合格的人力资源,非常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虽然由于其他原因,印度高等教育的重点主要在国内,但却引起了海外的极大兴趣。

由于高等教育体系的不健全,导致印度经济的若干部门面临着严重的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高校培养的几乎都是没有任何就业技能的普通毕业生。学术研究的质量不高且呈下降趋势。整体而言,印度的学术水平不及发达国家的平均标准,只有很少一部分高校达到了卓越。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作为卓越的代表,最近几年引起了颇多争议。政府单方面决定在高校中为其他落后阶级实施配额预留的制度,导致许多棘手问题的产生。

在2006年11月递交给总理的报告中,国家知识委员会(National Knowledge Commission)认为印度的高等教育存在“静悄悄的危机”。在新德里举行的校长大会上,国家人力资源部部长抱怨印度的高等教育是印度教育中“生病的孩子”。因此,政府大幅度提高公共经费、建立许多新高校的举动并不令人奇怪。印度政府渴望把大学适龄人口的入学率从现在的11%提高到2012年的20%。

公共经费的增加、新学校的建立以及入学率的提高都带来了高等教育的进步。然而,印度高等教育目前的危机是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而非该系统突然出现的一些问题。当经济蓬勃发展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就会增加。规模庞大且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通过教育来提高子女的收入和向上流动的能力。这种迫切的需求增长得非常迅速。高等教育的僵化及其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的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

关注的内容

印度的高度教育系统已经发展了数百年,深受本国历史和文化的影 响。自从19世纪中叶建立第一批现代意义的大学和学院开始,关注的重点一直是艺术与人文学科。因此,一半的毕业生都是获得艺术和人文学位,几乎4/5的毕业生没有就业技能。因此,印度(像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大量毕业生失业与技术人才短缺并存的局面。美国的情况则相反,尽管也很强调通识教育,但在数百年的高度教育发展中非常注重职业教育。

另一个关注的问题是高等教育体系的僵化。在这个过时的系统中,有18,000多所学院附属于120所大学。剩余的250所大学没有附属学院。附属制度曾经有益于工程和医学领域职业教育的迅速扩张,职业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但在某些情况下,学术自治对于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的确定至关重要,此时附属制度就成了扼杀创新与试验的瓶颈。但是如今的劳动力市场需要大量具有各种技能的毕业生。此外,附属制度也导致一些学院规模偏小且经营不善。这些学院资源贫乏,学习的都是固定的课程,目的则是应付考试,最多也就算是个补习班。

目前的高校问责制范围广,要求多。由于对高等教育目标的界定非常含糊,高等教育的质量难以衡量,当公立高校被要求提供特定课程时,它们往往以自治为托词。政治影响力巨大且严重工会化的学术界与现实脱节并拒绝改革。资金贫乏和教师积极性低下,导致公立高校的水平迅速下降。不幸的是,公共资金的增加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问题的解决

因此，印度高等教育产生危机的原因在于其系统结构，这个结构源自印度高等教育的历史，并且与高等教育本身具有的目标和质量难以界定的性质有关。然而，为了应对社会压力和市场力量，印度的高等教育在过去的20年经历了转型，私立高等教育呈爆炸式增长。甚至公立高校也开设了大量自筹经费的专业，其中大部分聚焦于职业教育。这种做法保证了毕业生的技能更能适应自己的喜好以及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私立高校的增加导致了对公平、质量和剥削的关注。由于大多数人发现职业教育很实用，所以几乎所有的职业教育都收费高昂（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高校），结果导致穷人没有能力接受职业教育。除了以公平的名义阻止普通高等教育费用上涨外，在设立足够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方面的举措非常少。为了提高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解决公平的问题，迫切需要这些举措。

印度已经建立认证机构，以确保质量并严格监管招生与收费。然而由于目标与行动之间有差距，所以进展一直很有限。由于缺乏透明和公平竞争，私立高校缺乏动力不做错事。随着质量的持续下降，以及一些私立高校肆意从事不法行为，导致私立高等教育的整体形象很糟糕。

对于附属制度，与其废除这种制度（如

一些人所建议的），不如利用这种制度的优势扩大各地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通过传统模式和远程教育模式解决质量问题。高等教育的加强需要将大学和学院进行合并或联盟，以便进行智力交流、产生协同效应以及共享基础设施与设备。每一个合并后的实体都应当被给予充分的学术自主以进行实验与创新。

结论

为了满足大众不断提高的需求和渴望，需要四管齐下的做法。首先，私立高校需要立足于当前的现实，在公平且透明的环境中发展。第二，附属制度应根据扩大各地区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原则进行改革，建立规模大小适度的高校。第三，必须在新增的资金和创新的投资机制中建立激励措施，鼓励公立大学做正确的事情并不断改革。第四，建立经费充足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制度，保证任何人不会因为贫穷而被剥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根据实用主义的原则，印度政府最多只能新建几所顶级高校并支持公共研究，对高等教育的持续支持及其发展也可以通过私有资金进行。公平问题可以通过为赤贫者设计合适的按收入比例还款的助学贷款制度来解决。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助于纠正印度长期以来对人文艺术教育的偏颇。因此，当印度经济处于起飞阶段时，政府应该指导并加快印度高等教育的转变，支持经济的发展。

韦丹塔大学：难以实现的梦想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高等教育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阿尼尔·阿加瓦尔(Anil Agarwal)建立世界一流韦丹塔大学(Vedanta University)的想法非常宏大,但可能不太现实。这所大学计划于2008年在印度奥里萨邦(Orissa)投入使用。矿业巨头阿加瓦尔已承诺第一期向该项目投入10亿美元。该项目的进展包括聘请了国际知名建筑师,奥里萨邦当局的加入,以及从世界各地聘请了一批学术带头人。其构想是建立一所有10万名学生的大学,专业涵盖在各主要的学科领域,并且强调跨学科的方法。学校的组织细节目前还没有被透露,但看起来像哈佛和斯坦福大学。虽然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对高等教育感兴趣始终是件好事,但不管阿加瓦尔先生投入多少资金,韦丹塔大学是不太可能达到预期目标的。

在印度,那么多新兴私立高校的实际目的都是营利,并且主要关注一小部分需求量大的职业教育领域,出现一位举足轻重的实业家投资高等教育是件好事。韦丹塔大学的目标是覆盖一系列学科而不只是企业管理或信息技术学科,这种明确的公众利益动机也非常令人振奋。

韦丹塔大学是否有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的教育理念和策略?在资金的背后是否存在教育愿景?建设令人印象深刻的硬件设施只是一个开始,但绝对不确保最后的成功。任何大学的核心都是那些从事实际学术工作的教师,并且必须做到教授治学。具有知识分子的视野和建设管理复杂组织的能力的学术领导人也是必需的条件。

10亿美元听起来好像是很大一笔钱,但用于有10万名学生的大学时,实际上只是一个适中的数目。研究型大学的运营成本必须与校园建设的成本分开。像哈佛和斯坦福这样的大学,年度预算都是10亿美元;欧洲的主要大学花费虽少一些,但也差不多。美

国研究型大学的运营经费平均都接近5亿美元。

世界上没有一所研究型大学有10万名学生,甚至接近该数目的也没有。从1890年建立时就旨在成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芝加哥大学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流大学之一,在校生为13,700人,其中4,000名为本科生,每年的预算超过10亿美元。该校最重要的捐赠者约翰·洛克菲勒先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更重要的是,芝加哥大学创建时的校长威廉·雷尼·哈伯(William Rainey Harper)对学校的发展很有想法,并且有能力实现这些想法。理念先行,资金跟上。高薪和学术自由与自治的承诺,也吸引了许多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到这所新的大学。学校地处当时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该市是20世纪初新兴技术的中心。斯坦福大学创建于1891年,花了更长的时间才发展成熟。学校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成为一所重要的研究型大学,主要受益于具有创新精神的学校领导人和加州北部硅谷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斯坦福大学的在校生规模和预算类似于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例子对于韦丹塔大学有一些借鉴意义,对印度的高等教育也一样。为10万名学生服务的目标将导致韦丹塔大学的毁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为美国最大的顶尖高校之一,其33,000人的在校生规模确实已经到了上限。印度理工学院、伯拉理工学院(Birl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等高校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规模较小、便于管理,因此能够保持高标准并形成真正的学术团体。

地理位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难想象世界一流大学会出现在偏远的奥里萨邦。世界上大部分的著名大学都位于或靠近大都市。印度极受尊重的理工学院大都靠近

主要城市。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的例外。当美国在19世纪仍处于农业社会时，就在农村地区建立了若干所名牌公立大学，包括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地区的学术联合体也在偏远地区。伯拉理工学院在彼拉尼（Pilani）做得也很好。但所有这些高校在维持卓越地位的时候，都在努力克服地理位置孤立的问题，因为很难吸引学者和学生到偏僻的地方，也很难支持文化智力机构。即使在网络时代，地理位置也非常重要。事实上，可以说在全球化的时代，地理位置甚至更为重要，因为所有的一流大学都必须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位于偏远的奥里萨邦的韦丹塔大学不太可能非常有吸引力。

韦丹塔大学将会成为公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成功的私立研究型大学都在美国和日本，几乎没有任何例外。剩下的全部都是国家支持的公立大学。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研究型大学的维持成本太高。仅仅把资金

都投入到校园建设和开办活动是不够的，著名研究型大学一直都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其中一些必须是公共资源。其余的经费可以通过学生的学杂费和教授们获得的科研经费获得。世界上有许多的研究型大学因为缺乏持续的财政支持，可能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虽然10亿或30亿美元是一笔巨大的投资，并且足以建立世界一流的设施，但是一旦大学开始运营，还需要额外的资金来维持，特别是在最初几年。

韦丹塔大学将成为坐落于奥里萨邦的全球性大学，还是成为在全球有重大影响的印度大学？如果成为全球性大学，那么它将如何为印度的发展做贡献？如果是印度大学，它会被众所周知的影响印度高等教育的官僚统治、轻微的腐败和其他问题压倒吗？根据目前的现实，不能对韦丹塔大学的成功持非常乐观的态度。但愿这个项目的资助者能够有先见之明，提前预见到可能出现的问题，最大程度地提高成功的机会。

以色列的教育危机：原罪的代价

Roxana Reichman

以色列海法市戈登教育学院 (Gordon College of Education) 研究生教育主管

电子邮箱: roxanar@gordon.ac.il

由于高等教育体系中时间最长的罢工运动，以色列的教育部门近来面临着瘫痪的危险。自从2001年合同期满后，7所研究型大学的4,500名资深教授开始要求赔偿过去十年中被侵蚀的35%工资。

人才外流：应对方式

教授们要求加薪并且用罢工进行阻止人才外流的战斗，人才外流是以色列大学的工作条件被破坏的直接后果。财政部声称，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需要全面贯彻并落实彻特委员会 (Shochat Committee) 的改革，但这项改革已经遭到学生的拒绝，因为改革可能导致政府把学费提高100%，而不是政府先前曾同意的减少50%的学费。

资深教授们对十多年来预算被削减后造成的人才外流和大学状况日益恶化的问题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警告。然而，当更多的兼职教师没有任何基本权利的情况下被雇用，教授们改变了立场。他们很高兴自己的教学任务被减轻，也不用在学生的兴趣或者兼职教师的工作条件上投入过多的精力。

最近几年，以色列的大学发生过两起重要的罢工罢课事件。当政府试图通过提高一倍的学费来筹集高等教育经费时，学生组织了第一场罢课。第二场是兼职教师为了改善工作环境、享受带薪休假和抚恤金而组织的罢工。在这两次罢工罢课中，没有任何资深教授参加或提供支持。同样地，当政府削减800个终身教职时，只要自己的职位没有受到威胁，教授们也没有为人才的外流举行罢工。因为教授们在其他罢工中因态度冷漠而犯下的原罪，结果导致教授们不得不独自进行斗争，群众支持也降到了最低点。

以色列政府的撤离所造成的人才外流危险确实确实的存在着，并且可以被看作是政

府一再以惊人的比例削减高等教育预算的直接后果。数字可以说明一切：在美国大学工作的以色列学者高于在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大学工作的人数总和；2003-2004年度的统计显示，在美国高校工作的以色列资深教授的数量（不包括正在进行学术休假的人），是在以色列高校工作的资深教授总数的25%，某些领域甚至更高（如计算机科学是33%，经济学是29%）。相比较而言，在国外工作的资深教授比例，西班牙是1.3%、英国是2.1%、法国是2.9%。对于总共只有7所研究型大学的以色列来讲，削减800个终生教职相当于关闭了一所大学。

以色列在60年前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建国后的前30年中，政府为这个年轻的国家制定了战略规划，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进行了投入。但在后面的30年中，各界政府在教育和高等教育上的投入越来越少。结果，目前以色列大学里的资深教授数量只比30年前高出10%，考虑到人口的增加，实际上是相当于减少了50%。

工作条件

为了避免出现资深教授必须通过兼职的额外工作来提高自己收入的状况，他们应得到一份体面的薪水，以便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工作中去。没有人希望以色列与其他国家在学者的薪水方面进行竞争，但资深教授确实享有终身教职和体面的工作条件。年轻的教师同样应该有权利期望在学术上享有适当的机会获得终身教职和晋升，尽管年轻研究人员发现自己在以色列大学中可选择的余地很小，或根本没有。

在资深教授学术罢工期间，高中教师进行了有史以来最长的罢工（63天）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高中教师为惠及所有学生的

小班教学进行斗争后，只获得了 8.5% 的加薪幅度；而教授们没有提出任何对社会改革或增加大学财政预算的要求，却获得了 24% 的加薪幅度。

结论

非常不幸的是，所有这些罢工没有能够联合起来改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最好的策略本该是在事情发展到最糟糕的状态之前，联合所有的力量向拯救教育系统这个共

同的目标迈进。但很不幸，适者生存的法则再次奏效。

政府对待两次罢工的态度最多只能说是漠不关心，让人觉得这是将整个社会全面私有化计划中的一部分。以色列的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因此，在经济状况好转的情况下，政府不愿意在每个人都认为对以色列的未来至关重要的教育上进行投资，这种状况令人担忧。

以色列私立大学的比较优势

Danil C. Levy

美国奥尔巴尼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系统)教授

电子邮箱: dlevy@albany.edu

以色列的私立高等教育已经发展得很强大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还没有私立高等教育。但现在已有9所私立高校,还有不止6所学校正在争取政府的授权。2005年,共有26,860名学生就读于这些高校,占全国学生总数的13%,这个比例尚在不断攀升。

然而,以色列的公立高等教育依然比私立高等教育强大很多。以色列只有私立学院(通常没有明显的科研倾向),依然缺乏私立大学。与此相反,公立高校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87%,这些学生不仅是在学院而且大部分是在大学就读。7所公立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全部进入世界大学500强。因此,当笔者提出私立高等教育的实力现在值得注意时,并不是基于公私立高等教育之间的比较,而是基于对私立高等教育的过去(甚至是刚刚经过的过去)和现在的比较。

官方对私立高校的定义是“不享受国家预算”,即政府对其没有补贴。这样的定义避免了使用“私立”一词,许多公民认为这个词对高等教育来讲是非法的。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做法,经常采用“非公立”的说法。不允许建立私立“大学”是那些支持以色列私立高校者的痛处所在。一所具有反叛精神的私立学院宣布,它将很快自称为大学。另一些学院则在学校信纸的地址栏中标明“×××大学路”的字样。

与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相比,以色列是私立高等教育发展较早的国家。根据私立高校学生数占全国所有高校学生总数的比例来看,以色列的私立高等教育在该地区实力也最强。然而,几乎所有的周边国家现在都已经开始建立私立高校。如果从全球范围来看,以色列的私立高等教育是后发者,其13%的份额更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私立高校和公立高校的比较

以色列公立和私立高校的比较特征,大部分都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类似。私立高校往往规模较小,地理位置更集中。因为大多数以色列著名私立高校80%的收入都依靠学费,远高于公立大学的比例,因此其学生来自较高的社会经济阶层的情况也很正常。虽然没有政府投入,但私立高校希望能够争取公共科研经费;尽管它们不要求定期补助学校,但仍希望政府直接补助学生。因此,即使在部分私有化的公立大学中,公共经费和私有经费的差距仍旧对比强烈。

以色列公立与私立高校之间最明显的差别也许是学科领域的不同。即使不考虑大学这种情况,两者之间的差别也远远超过全球的情况。私立高校集中在一小部分学科领域能很好地说明这一情况。以色列私立学院79%的在校生都集中在两大学科领域,法律(49%)和工商管理(30%)。而公立学院两个学科的情况则分别是0和11%。以色列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空间依旧很窄,与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一样,学术体系中水平最高、学科范围广的高校依然属于公立阵营。

然而在其他方面,以色列公立与私立学院的差别并不那么尖锐。例如,62%的私立高校学生就读于特拉维夫市以及其他重要地理中心的高校,同时,41%的公立高校学生也在那些城市。私立高校65%的学生来自上层阶级,而公立高校的学生并不反映以色列的阶层和人口特征。只有2%的私立高校学生是新移民,但是公立大学的比例也仅为5%。因此就某些方面而言,以色列公立和私立高校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以色列的私立高校与全球高校

对以色列和其他地方的私立高等教育进行比较后,可以发现以色列私立高校的相对优势。就质量而言,尽管大多数国家私立高校在学术上的表现并不出色,但似乎在学生进入就业市场方面交出了良好的成绩单,这也是全世界私立高校的普遍目标。此外,如果以色列9所私立高校中至少有4所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个相当高的比例,全球大多数私立高校的学术水平都相当低。由于以色列这些私立高校的学术质量、吸引力、严肃性、信誉和创业精神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因此甚至可以认为这些学校是“半精英型”高校。世界上大多数私立高校都没有这样的成就。

以色列私立高校有一些高水平的教师,其中有一些甚至是全国著名学者,这一点从全球来看不同寻常。实际上,以色列公立大学纷纷抱怨在招收优秀人才方面的困难越来越大,因为私立高校能够支付更高的报酬。与此相关并且同样特别的是,以色列私立高等教育得到了可观的慈善捐赠,这在美国以外的国家非常罕见。这项政策有利于雇用高水平的教师,建设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硬件设施,提供灵活性并获得信誉。

以色列私立高校不仅具有令人羡慕的不同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高校的正面特征,而且还没有大部分负面特征。以色列确实也有不可信任的需求导向型私立高校。此外,虽然以色列也有一些非营利性高校具有营利特征,这些学校被批评追求利益,但以色列仍然与允许进行营利性教育的国际趋势保持着距离。

政府的作用

跟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以色列的私立高校抱怨自己的优势被政府的监管削弱了。事实上以色列关于政府监管的讨论与其他国家的情况基本类似。

与教育部相比,以色列私立高校认为国家高等教育委员是更大的障碍。因为政治联盟改变和部长经常被更换等问题,私立高校认为政府难以打交道,但政府至少有时对来自私立高校和学生的压力是有回应的,政府乐于看到在不增加公共支出的情况下提高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以及为就业市场服务。私立高校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高等教育委员会主要关注更适用于公立高校的学术问题,因此建立了很多限制条件,不仅降低了私立高校发展所需要的速度、灵活性和创新,还妨碍了高等教育体系的分化、没有公共支出的入学机会以及确定私立高校价值的市场测评。

公立高校经常反对私立高校希望加强自身实力的要求。公立高校有时确实认为监管和质量保障有助于私立高校,但常见的是在全社会寻求对公立高校及其价值的保护。它们还认为私立高校实际上享有充分的自治(如自主决定招生人数、学费、教师的工资以及新专业的设立)。换句话说,私立高校已经具有加强自身实力的自主权。

与普遍的国际趋势一样,要求监管私立高校的是公立大学,但公立学院却特别害怕与那些重视热门学科教学和培训的私立高校竞争。公立学院不像公立大学那样位于高等教育体系的学术之巅,因此私立学院的实力对公立学院而言是一种威胁。

排名、多元化与卓越：欧洲政策所面临的挑战？

Ellen Hazelkorn

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学院高等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ellen.hazelkorn.@dit.ie

2007年11月23日《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的头条是“为了竞争，德国决心重建科研优势”。文章详细记叙了对德国高等教育在世界排名中的表现进行评估后，政府如何开展各项计划，创建德国的“常春藤联盟”。继法国、俄罗斯和丹麦等国之后，德国也实施了类似的“卓越计划”。就在同一天，欧盟也通过了一项决议，重申“加快大学改革……以便涌现或加强具有国际卓越水平的欧洲高校”。

此外，高校自己也采取了各种措施，比如与竞争对手合并以提高实力，如北伦敦大学和伦敦吉尔德霍尔大学(Guildhall University)合并成伦敦城市大学，曼彻斯特理工大学和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合并建立曼彻斯特大学。再比如创建研究型大学全球网络，如21世纪大学联盟(Universitas 21)、科英布拉集团(Coimbra Group)、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世界大学网络和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等。

以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为代表的全球大学排名强调科研是高等教育的决定性特征。在世界范围内，政府和高校都在回应排名，这些发展正在迫使高等教育体系做出改变。这一趋势在欧洲特别明显，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和欧洲科研区的努力正在挑战对高等教育体系以及保持平等、多元和卓越之间平衡的传统假设。

排名的影响

排名不仅体现而且还推动了全球高等教育竞争。尽管高等教育领导人批评排名的方法论，但他们相信排名有助于维持和建立学校的声誉；学生使用排名来选择大学，特别是在研究生教育阶段；排名还影响国家和国际的合作。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在对认证、经

费投入、赞助和员工招聘等事项做出决定时也参考排名。

虽然很多人因为方法的缺陷而拒绝排名，但排名不可能被忽视，并且已成为推动政府制定政策和学校制定战略的力量。由于实现“世界一流”的成本问题，许多国家的政府对是否应该把科研集中在若干所或若干组高校存有疑问。高校的竞争力越强，就越能获得更高的排名，在这种信念的作用下，高等教育改革的脚步正在加快。

二元体系的终结？

在二战后的大众化教育时代，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通过立法机制来强化高等教育使命的多样化，将高校分为两种不同的院校类型，形成了二元体系。与“传统”的大学不同，多技术学院(polytechnics)、高等专科学校(Fachhochschulen)、专业学院(hogescholen)、理工学院(institutes of technology)和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s)所提供的是满足地方需求的职业或者专业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分注重文凭、为了巩固学校的优势而不断加强科研，以及最近的博洛尼亚进程，开始模糊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技术教育与传统教育之间的界限。大学和新的高校都出现了“使命偏移”，导致在这些高校中出现了法律规定的与实际存在的研究功能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今，高校的命名更多地受政治的影响而不是由认证本身决定。

高等教育政策反映了这些发展。直到最近，对大众化/民主化和入学机会才给予重视，以便让更多的人接受更好的教育。虽然理工学院或专科学校总是受到不同待遇，少数几个国家也对学生入学施加了障碍，但民众或政府对各种高校几乎没有歧视。强调的

重点是质量、世界一流水平和学生选拔。许多国家正在摒弃原有的监管机制，走向更加模糊的指导和竞争，以便促进高校垂直分化。

极少有政府仿效英国政府 1992 年突然把多技术学院转变为综合性大学的做法，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而且步伐正在加快。例如，挪威 1995 年颁布的法令打开了学院申请大学地位的小闸门，一个委员会目前正在根据国家战略努力平衡各学校的升格要求。爱尔兰也面临类似的压力，但是最近选择了提高研究能力，主要通过向跨部门的基础设施建设、研究项目以及区域合作投入经费的方法。佛兰德地区（Flanders）已成立“大学协会”，在专业学院和大学之间进行沟通，鼓励科研合作。荷兰、德国和瑞士的高等专科学校和专业学院已经采用“应用科技大学”的头衔，以便与实行博洛尼亚进程后的世界保持一致并进行国际竞争。无论是荷兰还是瑞士都已经重新考虑采纳二元体系。即将出台的瑞士法律提出一种妥协，即在单一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建立正式的二元体系。

这些改变正在引起政府的回应。欧洲大学联盟最近对吸纳传统大学之外的成员展开了讨论，但是遭到担心竞争加剧或资源减少的大学的反对。这样的反应可能表明不愿正式结束或重新界定二元系统。爱尔兰的大学正在分化成从事第三级（本科教育）和第四

级（研究生教育）教育的高校，英国的大学则分化为教学型大学和研究型大学。与此同时，一个新建的应用科技大学网络（<http://www.uasnet.org>）很可能马上开始发挥作用。

新的面貌？

虽然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但确实都表明改革欧洲高校的迫切性在不断增加，同时各国也承认传统大学再也不能满足地缘政治对研究、开发和创新的需求。作为该进程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正在为建立欧洲的“卡内基分类法”提供资金，重点在于扩大高校横向和纵向的分化。

欧洲社会至今都认为教育是社会公共产品，每个人只需付很少或根本不付费就能上学。虽然排名不是改变的原因，但却激起了有关声誉的“军备竞赛”，导致公平和卓越之间出现紧张关系。政府正逐步采用市场机制与竞争性拨款或基于绩效拨款相结合的方式拨款，要求高校有明确的使命或绩效合约（performance contracts）。虽然法律上的二元体系可能在一些国家继续存在，但一元高等教育体系的创建将进一步削弱二元体系。这将是一个适者生存的游戏。

大学的绩效拨款：意大利的经验

Tommaso Agasisti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 (Politecnico di Milano) 管理、经济与工业工程系

电子邮箱: tommaso.agasisti@polimi.it

高等教育体系中一个普遍的国际趋势是大学的自主权不断增长，特别是在财政方面。中央政府的角色已经变为从政策上确定优先发展的事项和制定财政激励机制，促使自治的大学以这些优先事项为自己的目标。因此，设计出一种在大学之间分配公共资源的优秀模式非常重要。

上述趋势在意大利特别明显，意大利的大学过去只有很少的自治权，服从中央政府的管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意大利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大量改革。这些改革的目的包括提高大学的财政自主权，赋予学校教学组织的自主权，以及建立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预算方面的改革。1993年批准的法律确定了中央政府向大学分配资源的新原则。传统的方式是逐项预算，即中央政府按照单项活动向每所大学下拨经费（如支付教师工资或购买仪器设备）。由于这种做法不能激励大学形成自己的资源使用策略，因而被综合预算模式所取代，由每所大学自主管理预算。这项改革迫使大学变得更负责任，大学现在必须自主管理资源，不再受教育、大学和研究部的限制和建议。

第一种分配模式

在实施了相当长时间的政府通过随意的政治决策过程向大学划拨公共经费的模式之后，1997年政府引进了基于公式的拨款模式（formula-based funding model）。采用这种公式的明确目标是平衡大学之间的资源。以前的拨款模式不是根据大学的相关表现而是根据学校与政府部门之间签订合同的分配能力分配资源，造成了学校之间的不平衡。

这个公式在1997-2003年被采用，但只被用于分配一小部分公共预算，预算中的主要部分仍按照传统程序进行分配。1997年通

过该公式下拨的实际额度只有1.5%，但2003年提高到10%左右。

这个公式面临两大主要问题。第一，它没有考虑对所有意大利大学都非常重要的科研活动。第二，学生数所占的权重（70%）格外有利于规模大的学校。由于这些问题，政府放弃了这一分配公式，委任国家评估委员会重新制定新的公式。该委员会多年来一直采用绩效评估模式，尝试了多种方法衡量大学的活动，并且聘请了许多大学的专家加入。委员会的建议得到了学术界人士和政治家的认真对待。

新的分配模式

根据国家评估委员会的建议，政府2004年采用了新的公式。这个新公式主要包括三个指标：学生数量（33%）、教学活动的成效（33%）以及科研活动的数量和成效（33%）。

在第一个指标里，学生数量的权重根据各专业的教育成本确定，如医学专业学生数的权重高于经济学专业的。在第二个指标里，教学活动的成效根据学生获得的学分数和毕业生的数量来衡量，如“毕业时间”。最后一个指标是研究活动的成效，根据有能力从公共和私人企业与组织获得科研经费的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数量（包括助理研究员和博士生），以及从政府部门获得科研经费的成功率来确定。

政策启示

即使有很多批评意见，但新的模式似乎能够较好地应对意大利大学所面临的挑战。分配公式中的各项指标与国家的政策战略很协调，即不断地增加在校生的数量，通过从公司获得的资源提高科研质量，同时

这些指标也符合大学活动多维的特点。

我们可以从意大利的经验得出几点思考,也许还有些国际意义,有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绩效评价系统。首先,通过公式分配的资源数量必须非常高。尽管在意大利这一数字相当低,因为这个公式仅被用于一小部分公共预算的划拨。在2006和2007年,大约有99.5%的预算根据传统方式分配,仅有0.5%根据这个公式进行分配。为了提高激励措施的效果,必须立刻把采用公式分配的费用提高到至少公共资源的10%到15%。

其次,科研指标必须尽可能不断精确,包括质量的测量。意大利采用的科研指标依然非常粗糙,如论文发表数始终没有被考虑。采用精确测量方式的困难众所周知,但是如果改革的目标之一仍然是提高意大利大学科研活动的数量和质量,那么就必须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意大利国家评估委员会对研究

成果(出版物、专利等)进行定性评估的最新改革似乎是完善现有数据的可行办法。

最后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考虑到差异性。给予所有大学相同的激励措施,意味着接受它们活动的统一性。基于目前的分配原则,每所大学都应该提高自身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质量与数量,以便得到高分。与此相反,为了从整体上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率和效益,特别是在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差异越来越大的今天,大学教育的多样性及其分化似乎是一个积极的国际趋势。应对这一挑战的可行方案之一可能是根据不同的公式对科研和教学分别进行拨款。

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审视,既有助于重新思考目前在意大利大学系统中所采用的绩效拨款模式的一些重要特点,也有助于全世界对如何在大学之间更好地分配公共资源进行讨论。

伊朗高考危机

Shahraza Kamyab

国际教育咨询专家

电子邮箱: shahrzadkamyabphd@yahoo.com

伊朗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 高考是学生选拔的唯一标准, 有限的空间和资源限制了很有才华有热情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因此, 高考已经引起了众多不满和冲突。

每年6月, 伊朗的高中毕业生为了入读公立大学, 都要参加严酷的全国集中性高考, 被称为Konkur。半私立的自由大学(Azad University)举行独立的入学考试。高考的竞争非常激烈, 考试很严格, 大学录取率也非常有限。最近几年, 尽管政府已经通过大学扩招和创办自由大学对提高入学率的要求和申请者迅速增加的问题做出了回应, 但公立大学仍然只能接收10%的申请者。去年, 在140万申请者中仅有15万学生被录取, 其中约60%是女生, 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数量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已经翻了一番。与不收学费的公立大学相比, 自由大学收取高额学费并且设立类似高考但又相对容易的入学考试。尽管自由大学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 国内各校区的在校生总数达100万名左右, 但学生的录取率与公立大学相当。为了毕业后能够就业并且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申请者愿意支付昂贵的学费进入自由大学。

历史和趋势

伊朗的高考是历时4.5小时的综合性考试, 全部是多项选择题, 内容涵盖了高中教授的所有学科, 即数学、科学、伊斯兰教研究和外语。这场考试严酷异常, 以致普通学生需要花一年的时间备考; 那些高考失败的学生可以在来年重新参加考试, 直至通过。为那些热情高昂的学生提供补习课程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行业。科学、研究和技术部建立了教育评价组织来监督高考的各个方面。

作为伊朗大学入学的唯一标准, 伊朗的

高考经历了许多变革。在伊朗没有革命之前, 高考就像现在一样, 是大学招生时对学生进行的全面知识考察和学术成就评估。然而, 那个时期的问题是甄选方法有利于来自城市地区的候选人, 特别是那些来自上层及中上层家庭、受到较好的教育并准备得更充分的学生。因此, 大学录取的学生几乎有70-80%来自大城市。

在伊朗革命后的最初几年, 高考的目的从纯粹的知识考察转变为确保“大学伊斯兰化”的工具, 旨在接收那些认同革命观念的学生。高考不仅根据学术成绩来判断候选人, 还以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以及对伊斯兰政府的忠诚度为标准。

20世纪80年代早期, 伊朗引进了配额制度, 通过为那些弱势学生给予优惠待遇使甄选标准进一步民主化。在两伊战争结束后的一年, 伊朗通过了一项帮助残疾和志愿退伍军人进入大学学习的法律, 为退伍军人预留了40%的大学名额。

90年代早期伊朗又引进了另一个学生选拔标准, 给那些申请在自己所在省市学习的候选人以优先权, 旨在让学生留在本地接受高等教育。这项政策防止了学生移民到更大的城市中去。学生毕业后的服务要求也有助于为贫困地区提供教育和健康服务。

持续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曾经尝试改革大学的甄选标准, 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 但高考仍然是妨碍受教育机会平等的障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看, 与那些受配额制度青睐的学生相比, 配额标准对那些学业表现更优秀的考生十分不利。尽管增加了公立高校的基础设施并建立了“开放式”的自由大学, 但缺乏基础设施仍旧是导致学生被淘汰的另一个原

因。自由大学作为半私立的大学在管理上享有自治权，但其学位和课程都由科学、研究和技术部监管。

高考的另一个缺点在于考试自身的性质。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高考主要是根据以死记硬背为主的考试选取符合资格的申请人，结果伊朗的学校成为填鸭式教育的工厂。

特别在最近几年，伊朗的高考进一步造成了大量的人才外流并导致了許多心理和社会问题，如那些考试失败的青年经常产生焦虑、苦闷以及绝望。

可能的改革模式

在伊朗，进入大学，尤其是进入诸如德黑兰大学（Tehran University）或入学门槛极高的谢里夫工业大学（Sharif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等名牌公立大学，仍然是提高社会地位的手段之一，因为教育是决定阶级流动的重要因素。这些大学的毕业生更有机会在伊朗的好职业（医药、工程、法律）中得

到日益稀少的工作机会。在高考中获得成功或许是伊朗年轻人必须跳过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鸿沟。

由于伊朗的高考一直存在危机，当局正在考虑改变选拔学生的机制。正在考虑的可能之一是以高中三年的累积平均级点（GPA）作为大学的录取标准。虽然这项政策似乎比使用单一的考试来衡量学生的准备情况更人性化更公平，但仍然不能确保公平或揭示学生是否具有进一步学习的天分。也许除了累积平均级点以外，更有效的方法是把面试、论文写作和能力倾向测试也作为衡量学生是否有资格入读大学的标准。

另一个补救伊朗高考危机的长远办法是通过在伊朗高等教育体系中引入社区学院的概念，以入职后的教育和培训代替大学教育这种职前教育模式。希望这种做法有助于分流那些学术倾向不强的学生，最终减轻高考危机。

新书简介

Albornoz, Orlando. *La Libertad Académica y la Mentalidad Autoritaria* [Academic freedom and authoritarian mindset]. Caracas, Venezuela: Universidad Central de Venezuela, Ediciones de la Biblioteca, 2007.

作者在7篇文章中探讨了持两种不同观点的人之间的紧张局势，一部分人把大学作为推动委内瑞拉当局的“玻利瓦尔革命”的工具，另一部分人则努力捍卫在民主和学术统治下的高校的准则和价值观。

Fallis, George. *Multiversities, Ideas, and Democracy*.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7. 469 pp. \$65 (hb). ISBN 978-0-8020-9240-3. Addres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0 St. Mary St., Toronto ON M4Y 2W8, Canada.

经济学家佛利斯(Fallis)从历史和当代的视角分析了被其称之为“多科性大学”(multiversity)的现代研究型大学。他认为多科性大学是后工业时代的核心机构，肩负着特殊的社会责任。这些大学必须抵制时代带来的一些压力(如商业主义)，并且保持通识教育传统的活力。

Greenberg, Daniel S. *Science for Sale: The Perils, Rewards, and Delusions of Campus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324 pp. \$25 (hb). Web site: www.press.uchicago.edu. ISBN 0226306259.

作为一名著名记者，作者在本书中对美国研究型大学如何资助科学研究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因为科学商品化近几年在高等教育中的流行，因此作者特别关注这个趋势以及已出现的各种问题。该书作者对美国主要大

学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访谈，给出了最近几年对这一主要议题进行的最重要分析。

Kehm, Barbara, ed. *Looking Back to Look Forward: Analyses of Higher Education after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Kassel, Germany: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07. 192 pp. (pb). ISBN 978-3-934377-56-1. This publication is available electronically from http://www.uni-kassel.de/incher/v_pub/.

该书由一系列探讨当代高等教育问题的论文组成，主题包括高等教育体系的演变、英国的公平和就业机会、荷兰外部质量评估、市场与高等教育以及芬兰的博士生教育。

Kogan, Maurice, and Ulrich Teichler, eds. *Key Challenges to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Kassel, Germany: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07. 211 pp. (pb). ISBN 978-3-934377-59-2. This publication is available electronically from http://www.uni-kassel.de/incher/v_pub/cap1.pdf.

该书对学术职业目前的趋势进行了多角度分析，重点关注以下主题：教授们的期望(日本和墨西哥的个案研究)、国际化(日本、挪威和澳大利亚的个案研究为例)、学术管理与教授职位以及博士生培养。

Krishna, Sridhar, e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erspectives and Country Experiences*. Hyderabad, India: Icfai University Press, 2007. 234 pp. \$17 (pb). ISBN 81-314-1174-4. Web site: www.icfai.org.

全球化对大学的影响正被许多国家所关注。该书主要关注印度的情况，其中若干篇

论文就全球化和国际化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若干篇论文对美国、非洲、日本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进行了探讨，对印度的经验也进行了分析。

Kronman, Anthony T. *Education's End: Why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iven Up on the Meaning of Lif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08 pp. \$27.50 (hb). Web site: <http://www.yalebooks.com/>. ISBN 978300122886.

通过深入讨论美国高等教育中对人生意义进行哲学分析的重要性，该书探讨了大学削弱人文学科以及大量放弃教学的原因。

Lee, Sungho H. *Korean Higher Education: Its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 Seoul, Korea: Hakjisa, 2006. 319 pp. (pb). Korean won 20,000. ISBN 89-5891-335-5. Web site: www.hakjisa.co.kr.

该书包括一系列研究韩国高等教育的论文，对当前的趋势进行了分析。涉及的主题有韩国大学的研究环境、学术职业的出现、韩国教师的科研态度和做法、学术工作环境以及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韩国的高等教育。

Leisyte, Liudvika. *University Governance and Academic Research: Case Studies of Research Units in Dutch and English Universities*. Enschede, Netherlands: CHEPS/UT, 2007. 427 pp. (pb). ISBN 978-90-365-2586-2. E-mail: secr@cheps.utwente.nl.

该书着眼于大学治理机制的改变对科研单位（以中世纪历史研究和生物科技研究为例）运作的影响问题，对治理机制与科研单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全书以访谈为基础，详细分析了科研单位的内部运作以及科研单位与大学之间的关系。

Locke, William, and Ulrich Teichler, eds. *The Changing Conditions of Academic Work and Careers in Select Countries*. Kassel, Germany: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07. 240 pp. (pb). ISBN 978-3-934377-55-4. This publication is available electronically from http://www.uni-kassel.de/incher/v_pub/cap2.pdf.

该书对香港、巴西、南非、捷克、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英国、挪威、芬兰和葡萄牙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目前学术职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特别关注外部压力和新校区的条件是如何影响教师的。

Maher, Frances A., and Mary Kay Thompson Tetreault. *Privilege and Diversity in the Academ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232 pp. (pb). ISBN 0-415-94665-4. Web site: taylorandfrancisgroup.com.

该书主要研究美国大学如何变得更加复杂的问题。通过对私立研究型大学（斯坦福大学）、公立研究型大学（密西根大学）、综合性城市大学（罗格斯大学纽华克分校）的三个个案研究，集中讨论了在学术机构努力改善自身形象和声望背景下的多样性问题。

Marshall, Stephanie, ed. *Strategic Leadership of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 What's New?*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227 pp. \$44.95 (pb). ISBN 978-0-415-41173-8.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该书讨论了高等教育变革中的领导者问题，从相关利益者的反馈意见和英国的个案研究出发，就如何实施变革以及解决变革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实践经验。

Martin, Michaela, and Antony Stella. *Ex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Making Choices*. Paris: UNESC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 2007. 111 pp. (pb). ISBN 978-92-803-1304-8. Address: UNESCO, 7 Pl. de Fontenoy, 75352 Paris, France.

该书是决策制定者的实用指南，书中详细讨论了在国际化环境中实施外部质量保证的办法。这一分析是基于当前强调质量保证的背景下进行的，重点是外部机构如何协助大学进行质量评估，指出了基于高校的质量保证机制与外部问责制之间的关系。

Matthews, Joseph R. *Library Assess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Westport, CT: Libraries Unlimited, 2007. 156 pp. \$45 (hb). ISBN 1-59158-531-7. Web site: www.lu.com.

该书为图书馆管理人员而写，教授如何评估学术机构，对高校和图书馆的评估过程和评估理论进行了探讨。尽管该书的写作背景是美国，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管理人员也有借鉴意义。

Morrill, Richard L. *Strategic Leadership: Integrating Strategy and Leadership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stport, CT: Praeger, 2007. 288 pp. \$59.95 (hb). ISBN 0-275-99391-4. Web site: www.praeger.com.

摩雷尔 (Morrill) 作为美国大学的前校长，认为制定详细的战略方针可以帮助学术带头人应对资金危机、市场问题、全球化等挑战，而对学术决策背后的价值观和信仰进行分析则有利于形成战略思想。

Moris, Zailan, Hajar Abdul Rahim, and Shakila Abdul Manan, ed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Emerging Trends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Pulau Penang, Malaysia: Penerbit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2008. 309 pp. (pb). ISBN 978-983-3986-13-2.

该书的重点是教与学，主要侧重于马来西亚的情况，但有些章节也涉及东南亚的情况。其主题涉及马来西亚毕业生在就业中的性别差异、英语教学、工科专业的性别差异、研究生的学习经验等问题。

Mugabushaka, Alexis-Michel, Harald Schomburg, and Ulrich Teichler, eds. *Higher Education and Work in Africa: A Comparative Empirical Study in Selected Countries*. Kassel, Germany: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07. 137 pp. (pb). ISBN 978-3-93437-54-7. This publication is available electronically from http://www.uni-kassel.de/incher/v_pub/wb69.pdf

该书根据对非洲毕业生就业情况所做的第一次比较调查撰写而成。该调查包括6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加纳、肯尼亚、马拉维、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根据相同的调查问卷，该书各章节对就业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包括工作满意度、自雇谋生以及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看法。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Cross-border Tertiary Education: A Way Towards Capacity Development*.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07. 199 pp. (pb). Web site: www.oecd.org/publishing. ISBN 978-92-64-03363-4.

该书对跨界高等教育的若干要素进行了分析，重点是讨论跨界高等教育对提高能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能力的贡献。涉及的主题包括：贸易自由化和《服务贸易总协定》在

扩大跨界教育活动中的作用、质量保证的作用以及对全球跨界教育活动的分析。

Sanaghan, Patrick, Larry Goldstein, and Kathleen D. Gaval. *Presidential Transitions: It's Not Just the Position, It's the Transition.* Westport, CT: Praeger, 2007. 224 pp. \$49.50 (hb). ISBN 0-275-99408-2. Web site: www.praeger.com.

以对美国高级学术领导者的访谈为基础,该书主要探讨校长转型(transition)问题,作者认为这个问题对确保美国大学领导者的成功非常重要而糟糕的管理转型可能会损害学术机构。该书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Stephan, Paula E. and Ronald G. Ehrenberg, eds., *Science and the University.*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7. 304 pp. \$50 (ph). ISBN 978-0-224480-6. Web site: www.wisc.edu/wisconsinpress.

该书对科学研究在美国大学中日益复杂的作用进行了广泛讨论,着重探讨了为科学和工程研究提供资金、科学商品化、外国学生和学者的作用以及美国科学的竞争力等问题。国际读者对这本书会很感兴趣。

Stevens, Mitchell L. *Creating a Class: College Admissions and the Education of Eli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08 pp. \$25.95 (hb). ISBN 978-0-674-02673-5. Web site: www.hup.harvard.edu.

作者根据一年多的参与式观察研究,分析了美国某学院的招生过程,对该学院如何吸引申请者以及如何选择插班生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分析。

Teichler, Ulrich.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Conceptual Framework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mpirical Findings.*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Publishers, 2007. 289 pp. \$49 (pb). ISBN 978-90-8790-137-0. Web site: www.sensepublishers.com.

该书是欧洲最杰出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乌尔里·希泰希勒的文集,文章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涉及的主题有欧洲高等教育不断改变的作用、入学机会和招生、高校的多样性、博洛尼亚进程、卓越观念在欧洲的转变以及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

Tierney, William G., and Guilbert C. Hentschke. *New Players, Different Game: Understanding the Rise of For-Profi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215 pp. \$38 (hb). ISBN 0-8018-8657-0.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该书对美国营利性和非营利性高等教育进行了比较,对了解这两种大学正在改变的角色提供了有效的方法。书中侧重于营利性高等教育,通过比较营利性高校与传统大学的差异,对教师的作用、学生、财政与治理以及学校文化等主题进行了分析。通过这种创新的分析方法,作者提出了有用的洞见。

Walker, George, et al. *The Formation of Scholars: Rethinking Doctoral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8. 232 pp. (hb). ISBN 978-0-470-19743-1. Web site: www.josseybass.com.

通过对美国博士生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进行分析,该书提出了改善博士生教育的建议,包括重新考虑学徒制、拓展博士生教育的目的等。该书得到了很有影响力的卡内基教学促进会的赞助,对未来的博士

生教育可能会产生影响。

以下两本书出自马来西亚国家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系列丛书。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得详细信息：the IPPTN, Eureka Complex,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11800 Minden, Penang, Malaysia. E-mail: morshidi@usm.my.

Kaur, Sarjit, Morshidi, and Norzaini Azmanb, eds.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Malaysia*. Pulau Penang, Malaysia: Penerbit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2008. 373 pp. (pb). ISBN 978-983-861-345-3.

该书对全球化如何影响马来西亚的高等

教育进行了深入探讨，包括对若干宏观问题的分析，以及对诸如质量保证、再分配与公共财政、远程教育、留学生经历等具体问题的深入分析。

Shuib, Munir, Sarjit Kaur, and Rozinah Jamaludin, eds. *Governance and Leadership in Higher Education*. Pulau Penang, Malaysia: Penerbit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2008. 367 pp. (pb). ISBN 978-983-861-343-9.

该书的重点是高等教育政策和质量，主要讨论了学术自由、公立大学的管理、阿拉伯语在马来西亚的作用、马来西亚大学治理的绩效指标以及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若干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介

为了加快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上海交通大学于 2007 年 12 月 26 日在原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学校直属的"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称高教院)。高教院下设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国际高等教育》编辑部。

高教院坚持以实证和定量研究为特色，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为标志，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已经具有良好的国际声誉；以教育部科技委《专家建议》为标志，在政府咨询方面已经产生广泛的国内影响。

以小规模、创新型、国际化的世界知名人才培养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培养高等教育学、科学与技术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在校硕士生、博士生和在站博士后总人数的规划目标为 80 名，且大部分博士生有出国访学经历，留学生比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世界知名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研究团队，有选择地追求卓越，在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研究生教育研究、定量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等领域打造国际学术品牌。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GS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GSE aspires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scholarly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emphasiz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focuses on applied research, policy studies and consultation.

GSE builds on the tradition of excellence of the former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85. The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 which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03 and updated annually,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Consultation reports on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science policies, which are provided to Chinese governments on a regular basis, have attracted national attention.

GSE focuses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pecifically on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t has three research groups, namely the Center for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he centers will have world-class research teams, leading international partners, and a highly internationalized student body.

GSE will uphold the best academic values—a commitment to academic freedom and original inquiry, service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China and beyond, and provide the best possible education to graduate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policy.

Vol. 1, No. 2, July, 2008

Guoji Gaodeng Jiaoyu

(Translated from Number 51, Spring 2008,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Issues

The "Subprime" Market and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1
Foreign-Backed Universities: A New Trend	3
Academic Freedom in Muslim Societies	5

Private Developments

China's Private Universities	7
Demand-Absorbing Private Institutions in Mexico	9

African Perspectives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Projecting the Future	11
International Providers in Nigeria.....	13
Trends in Eritrea	15

India

India at a Crossroads.....	17
Vedanta University: A Flawed Pipe Dream.....	19

Israel

Crisis in Israel: Payback Time for the Original Sin	21
Israel's New Private College	23

European Trends

Rankings, Diversity, and Excellence: A European Policy Challenge?.....	25
Performance Funding in Italy	27

Countries and regions

Entrance Exam Crisis in Iran	29
------------------------------------	----

New Publications.....	31
-----------------------	----